

中欧经贸依赖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

寇 寇

内容提要:中国与欧盟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由于近年来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中欧经贸关系面临调整。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探究中欧经贸依赖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文章认为,中欧之间单向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有所降低,中国价值链的独立性不断提高,双方在制造业领域价值链高度融合且相互依赖,中东欧国家相比于西欧国家更加依赖中国。尽管欧盟对中国的依赖性上升,但仍占据全球贸易和价值链的优势地位。随着中美竞争加剧以及欧盟对华态度转变,后疫情时代中欧价值链面临短平化、就近化重塑,中欧企业的全球化策略将面临越来越高的政治风险。即便如此,鉴于双方价值链高度融合带来的广泛经济利益关系,经贸关系仍将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

关键词: 欧盟 依赖关系 国际贸易 全球价值链

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国际经贸关系融合程度正日益加深。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洲一体化等区域性机制以及WTO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经济全球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产业分工日益精细化,价值链将不同国家和不同企业连接在一起:发达国家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加工转移至成本更具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则利用技术和资本优势获取高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因人力、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参与制造组装,处于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部分,由此形成国家间的产业分工和相互依赖。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西方大型跨国企业成为价值链上的核心和主导。凭借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企业得以在全世界寻找最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百年大变局下中国与欧盟产业链协同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1CGJ024)的阶段性成果。

优的投资目的地,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给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同一个产品被切割为多个生产环节并在全世界分布,达到生产最优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产业水平分工通过市场调节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了全球经济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依赖。

全球经贸依赖度提高的同时,也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21世纪前20年,全球形成了三大区域性价值链网络——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① 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受益国之一,对国际企业的吸引力和重要性持续增长。而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态势也发生改变,根据麦肯锡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计算,21世纪以来世界在贸易、技术和资本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度均有所增加,亚洲邻国、资源丰富的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小型成熟经济体对中国依赖最高。而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度却有所降低,反映了国内市场对中国经济贡献率的上升。^②

中国与欧盟长期以来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欧关系的“稳定器”。截至2019年,欧盟连续15年保持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国主要的技术供给方。2020年中国取代美国首次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5860亿欧元,欧盟对华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5.6%和2.2%。在欧盟前十大货物贸易伙伴中,中欧贸易是唯一实现双向增长的贸易关系。^③ 双方在全球价值链上合作紧密,德法等西欧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上游,中国则主要处于中游,从上游供应商进口高质量零部件和技术进行生产,并借助技术溢出效应向上游攀升。贸易交往的密切以及疫情期间贸易额逆势上涨体现了中欧经贸合作和价值链融合的韧性。

然而国际治理体系以及大国关系的变化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欧盟强化“战略自主”,对中国防范增强,对华态度日趋强硬,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而且,欧盟的安全顾虑显著增加,认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不对等,中国崛起削弱了欧洲经济竞争力。^④ 从2017年起,德国已多次修改《对外经济条例》(Außenwirtschaftsverordnung),加强外资审查力度,目标直指中企在德并购潮。^⑤ 新冠疫情暴露了当前全球价值链过度分工的脆弱性,包括中欧在内的全球价值链面临深度调整。

^① WTO, IDE-JETRO, OECD, UIBE and World Bank,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9, p.27.

^②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China and the World: Inside the Dynamic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2019, pp. 4-6.

^③ 《欧盟统计局:中国2020年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2月16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2/16/content_5587302.htm。

^④ 刘兰芬、刘明礼:《欧盟对华经济合作中的“安全顾虑”》,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0期,第27页。

^⑤ 寇蔻、李莉文:《德国的外资安全审查与中企在德并购面临的新挑战》,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6期,第96-111页。

疫情期间,欧洲医疗卫生物资的短缺突显了欧盟对中国的依赖,欧盟开始重新思考对华战略以及对华依赖的风险。2020年,欧盟推出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指出将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关键民生服务以及涉及敏感信息领域的外商投资进行严格审查。2021年,欧盟发布《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强调供应网络的分散化布局,降低对外部市场关键原材料的过度依赖。

对中国而言,维护中欧经贸稳定,加强与欧盟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创新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尝试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中国与欧盟经贸依赖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探讨后疫情时代中欧价值链和经贸往来的调整方向。

一 新技术革命与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经贸依赖关系

国际经贸依赖关系产生的根本条件是全球化分工,全球价值链研究关注中间产品环节,寻找增值的来源地。这更能反映价值链碎片化的全球经贸格局,也更加准确地分析经贸依赖关系。罗伯特·库普曼(Robert Koopmann)等人针对全球价值链的复杂结构,提出将一个经济体的总出口按照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进行分解,以分析出口中不同部分的增加值来源地。^①总出口可以分解为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被国内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部分。国内增加值按照产品类型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国外增加值分为来自进口国的出口增加值以及来自第三国的出口增加值,^②由此建立了一套贸易总值和增加值统计的完整核算法则。

技术进步是推动分工演进的核心要素。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全球价值链结构和经贸依赖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彻底改变了产业的生产组织范式。^③数字技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信息资源的全球流通,而个性化、定制化的即时性生产方式让需求成为核心要素,对全球经贸关系进行多个维度的重塑。一方面,由于成本下降,跨国企业可能把部分制造业生产环节迁至发达经

^① Robert Koopman,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99, No.1, 2012, pp.178-189.

^② [美]杜大伟、[巴西]若译·吉勒尔梅·莱斯、王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寇蕊、史世伟:《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德经贸依赖关系》,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6期,第50-51页。

^③ 戴翔、张雨、刘星翰:《数字技术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新逻辑与中国对策》,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6页。

济体,以靠近高收入市场。市场不但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方,而且成为数据要素的重要来源地。另一方面,数字化增加了贸易的包容性,^①为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生产流程的标准化、模块化和数字化让复杂技术更易于扩散,其中标准化和模块化帮助企业减少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参与大型跨国企业供应网络的成本和门槛,数字化则进一步推动了标准化和模块化的应用范围,有利于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引进更先进和更复杂的技术,实现技术跃迁和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②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吕越和毛诗丝分析了1990-2018年的数据发现,制造业是欧盟成员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方式,但欧盟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近年来出现下降,^③而中国企业凭借对高科技产业的大量投入逐步提高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力量。^④近两年,新冠疫情也成为影响经贸关系的最新变量。疫情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疫情期间全球生产网络断裂导致价值链过长、分工过细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突显,强化了国家经济主权意识。一些国家为了保障供应安全、防止全球公共卫生风险扩散,采取了保护性手段,这或将全球价值链推入“脱钩”的边缘,进一步拖累本已放缓的全球化过程。余南平认为,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价值链出现整体规模萎缩,本土化、区域化加强,价值链数字化加速和世界主要大国拆解中国价值链五大典型特征,全球经济不稳定性提高,高强度政治博弈和冲突对抗发生的可能性增加。^⑤同时,疫情可能以间接方式强化贸易摩擦的冲击并使之长期化。^⑥即便如此,疫情并未导致全球经贸大面积萎缩,制造业尚未出现普遍的“生产回流”现象,且价值链在食品和基本医疗产品领域表现出强劲韧性。^⑦

具体到中欧价值链与经贸依赖关系,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对中欧经贸关系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疫情期间中欧经贸往来逆势上涨,双方合作复杂深入,

① Kathryn Lundquist and Jong Woo Kang: “Digital Platform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DB et al.,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Beyond Production*,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21>, 2021, p.179.

② WTO, IDE-JETRO, OECD, UIBE and World Bank,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p.85, 103.

③ 吕越、毛诗丝:《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及其决定因素分析》,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81-103页。

④ UNIDO and UIBE,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ttps://www.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2018-06/EBOOK_GVC.pdf.

⑤ 余南平:《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第3页。

⑥ 袁振邦、张群群:《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双重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与中国对策》,载《当代财经》,2021年第4期,第106页。

⑦ ADB et al.,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Beyond Production*.

加强经济合作符合双方经济复苏的共同需求。^① 另一方面,欧洲医疗卫生物资的短缺突显了欧盟在价值链上对中国依赖的担忧,主动降低对中国依赖的呼声高涨。不过彼得·埃平尔(Peter Eppinger)等通过数据推算出,即使将供应链移出中国,也难以避免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冲击。^② 虽然中欧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随着价值链越来越复杂,中间产品增加值重要性提高,单从进出口贸易一个角度难以准确反映国际经贸关系的真实面貌。比如尤尔根·马特斯(Jürgen Matthes)发现,仅依据进出口额会高估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因为从贸易增加值角度看,中德贸易的重要性远小于德国在西欧的贸易。^③

可以说,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动因是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带来的价值链格局重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不断攀升,欧美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下降。而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格局调整,成为价值链研究的最新推动力。不过现有研究少有专门针对中国与欧盟及成员国的价值链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产业上下游的关联。下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传统贸易与价值链相结合,侧重探究产业上下游联系,以此分析中欧经贸依赖关系及其变化和影响。

二 中欧经贸依赖关系: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崛起

一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对外经贸关系直接受到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和与外部经贸依赖关系的影响。价值链水平是体现一国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国家的核心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以及与外部的依赖关系决定了国家经济实力、国际话语权以及国际合作水平。在欧盟区域价值链网络内,德国处于核心位置,原因在于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全球领先的生产能力。^④ 在价值链全球化过程中,中欧双方共同利益广泛,中国借助欧洲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中国相对低价的进口商品让欧盟的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而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帮助欧盟工业制造业提高了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⑤ 本部分将从贸易和价值链的角度

^① 丁纯、纪昊楠:《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欧盟经济与中欧经贸关系》,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6期,第31-39页。

^② Peter Eppinger et al., "Covid-19 Shocking Global Value Chains," *Kiel Working Paper*, 2020, pp.1-36.

^③ Jürgen Matthes, "Zur Abhängigkei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China im Außenhandel—Eine Faktensammlung," *IW-Report*, No.43,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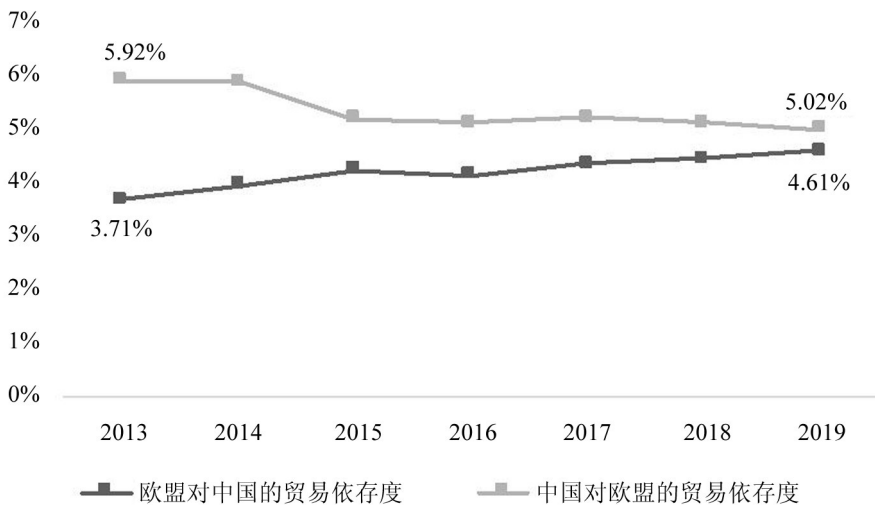
^④ 余南平、黄郑亮:《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载《欧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5-70页。

^⑤ "The State of China-European Union Economic Relations," Bruegel, *Working Paper*, Issue 9, 2019, p.9.

分析中欧之间的产业关系。贸易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活动,可以反映最终市场的供需。而价值链则从出口增加值的视角出发,着重反映传统贸易数据所忽视的中间产品产生的价值。

双边贸易方面,本部分重点关注中欧贸易依存度和贸易结构。中欧贸易额增长迅速,中国对欧盟出口额从2013年的2799.13亿欧元提高到2019年的4209.1亿欧元,欧盟对华出口额则从1481.15亿欧元提高到2251.37亿欧元,二者增幅均超过50%。在中欧贸易关系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且顺差额呈上升趋势,2019年达1957.73亿欧元。^①中国对欧出口主要是机电设备及消费品,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增加值也不断提升。而多数欧盟成员国的出口集中在欧盟内部,如欧盟最大出口国德国60%以上的出口发生在欧盟成员国之间。与此同时,中欧之间的贸易依存度^②不断接近(见图1)。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从2013年的5.92%下降到2019年的5.02%,而欧盟对华依存度则从3.71%上升到4.61%。从整体贸易来看,中国对欧盟的依赖度降低,而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度提高。

图1 2013-2019年中欧之间的贸易依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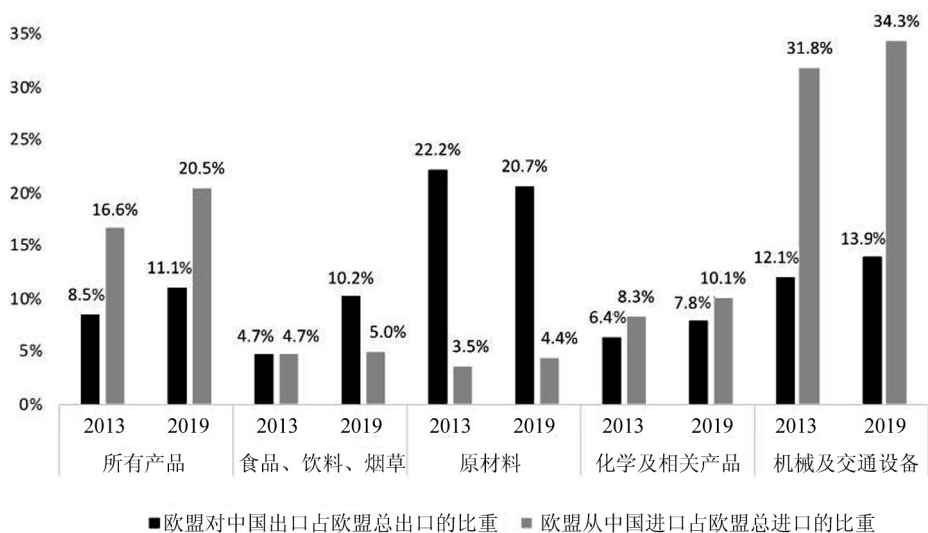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https://www.worldbank.org/>; UN Comtrade, <https://comtrade.un.org/>。

① 欧盟统计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② 贸易依存度=双边贸易总额/本国GDP。详见李孝天:《经济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冲突:成因、启示与前景》,载《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5期,第119页。

欧盟对华贸易依赖与双边贸易结构紧密相关。如图 2 所示,中国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逐年上升,欧盟对华出口额占欧盟总出口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8.5% 上升到 2019 年的 11.1%,而欧盟五分之一以上的进口额来自中国(2019 年)。从具体行业看,中国是欧盟原材料出口的主要目的地,2019 年欧盟 20.7% 的原材料出口至中国。不过就总量而言,机械及交通设备依然是中欧贸易份额最高的产品类别,2019 年欧盟对华出口机械及交通设备总额达到 1152.48 亿欧元。与此同时,欧盟 30% 以上的进口机械及交通设备来自中国,2019 年中国向欧盟的机械及交通设备出口额达到 2255 亿欧元,占中国对欧出口总额的 53.6%。^①

图 2 2013 年和 2019 年中欧贸易占欧盟进出口贸易的比重(按行业分)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表 1 展示了 2019 年欧盟最大的五个制造业进口产品类别中来自中国的比例。欧盟主要的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医疗设备、汽车及医药产品,其中电子设备和机械设备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分别达到 47.66% 和 35.79%,反映出中国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对欧洲市场的重要性。而欧洲另外两个强势制造业——汽车及医药产品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只有 9.86% 和 2.26%,处于较低水平。如表 2 所示,中

^①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国主要进口制造业产品中对欧盟依赖度最高的是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额中超过一半来自欧盟。此外,机械设备和医疗设备的依赖均超过 20%。由于进出口贸易主要反映厂商和终端市场的往来,可以看出,中欧在机械设备领域相互依赖度较高,欧盟单方面依赖中国的电子设备产品,而中国则高度依赖欧盟的汽车产业。总体而言,中欧双方的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的互补性。

表 1 2019 年欧盟主要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对中国的依赖(从中国进口额/总进口额)

电子设备及部件	47.66%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设备及其部件	35.79%
光学、检测、医疗设备及其部件	17.25%
汽车及零部件	9.86%
医药产品	2.26%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https://comtrade.un.org/>。

表 2 2019 年中国主要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对欧盟的依赖(从欧盟进口额/总进口额)

汽车及零部件	53.02%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设备及其部件	25.04%
光学、检测、医疗设备及其部件	20.65%
塑料制品	10.91%
电子设备及部件	6.74%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https://comtrade.un.org/>。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传统贸易统计侧重于最终产品,忽视了中间产品贸易创造的价值,无法反映增加值的来源及每个国家(地区)在生产网络中的全貌,^①因此,下文将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利用出口增加值对贸易数据进行补充分析。国际分工产生了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上游国家通过对外提供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其创造的附加值会进入下游国家,即间接附加值;而下游国家则需要进口上游国家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出口。下游国家出口增加值中由其他国家创造

^① 段小梅:《两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依赖关系——基于 TIVA 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2 期,第 93-105 页。

的部分就是国外增加值。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①通过对比一个经济体在价值链上增加值来源来反映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指标越高,说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越靠近上游。如表 3 所示,2005 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为-0.088,处于价值链下游,而欧盟则为 0.053,处于价值链上游,且位置远高于中国。不过随后十年双方位置差距逐步缩小,中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2015 年位置指数首次达到正值(0.002),而同一时期欧盟的价值链位置下降,但依旧高于中国。

表 3 2005-2015 年中欧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2005 年	2007 年	2009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中国	-0.088	-0.068	-0.029	-0.043	-0.035	0.002
欧盟	0.053	0.042	0.035	0.015	0.017	0.023

资料来源: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价值链不仅要考虑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还需对生产流程进行分解,以更准确地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中的关系。^② 因此,下文将中欧进出口产品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两类,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增加值占比反映了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下游的关联。中间产品处于价值链中上部,代表生产;而最终产品处于价值链末端,代表消费。表 4 展示了欧盟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出口增加值情况。中间产品方面,欧盟出口增加值中对华出口的占比在 2005-2015 年的十年间从 5.79% 提高到 12.08%,进口占比从 6.63% 提高到 12.62%,最终产品呈现与中间产品相同的增长态势。这反映了中国在欧盟价值链的生产和消费环节的重要性都有显著提升,已经成为欧盟重要的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上下游供应方。如表 5 所示,中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中对欧出口的占比均出现下降态势。2005 年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中对欧出口占比为 17.73%,2015 年为 14.61%;2005 年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中对欧出口占比为 19.24%,2015 年为 17.74%。这表明中国的海外市场更加多元化,欧盟在中国价值

^① 计算公式是: $GVC = \ln\left(1 + \frac{DVX}{Gross\ Exports}\right) - \ln\left(1 + \frac{FV}{Gross\ Exports}\right)$, 其中 DVX 是间接增加值,表示国内增加值中被他国用作出口的部分,FV 是国外增加值,表示本国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部分,Gross Exports 为出口增加值。参见 Robert Koopman, William Powers,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NBER Working Paper*, 16426, 2010, p.21。

^② 余南平、黄郑亮:《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第 45-70 页。

链体系中的下游供应商和下游市场的地位都有所下降。而从欧盟进口中间产品比例的提高(2005年和2015年分别为11.7%和13.07%)则表明,上游欧盟供应商的地位在提升。比较表4和表5可以发现,尽管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并且中国在欧盟上下游产业的重要性快速提升,但欧盟在中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出口结构中的占比依然高于中国在欧盟的占比,表明欧盟对于中国产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

表4 2005-2015年欧盟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出口增加值中的中国占比

		2005年	2007年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中间产品	欧盟对中国出口	5.79%	6.66%	7.60%	9.11%	9.94%	12.08%
	欧盟从中国进口	6.63%	8.59%	8.44%	8.91%	9.33%	12.62%
最终产品	欧盟对中国出口	3.88%	4.15%	5.64%	8.45%	8.62%	9.32%
	欧盟从中国进口	10.14%	13.64%	15.53%	18.78%	19.37%	19.80%

资料来源: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表5 2005-2015年中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出口增加值中的欧盟占比

		2005年	2007年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中间产品	中国对欧盟出口	17.73%	20.11%	17.96%	16.58%	14.19%	14.61%
	中国从欧盟进口	11.70%	12.00%	12.08%	10.83%	10.89%	13.07%
最终产品	中国对欧盟出口	19.24%	20.25%	21.11%	19.34%	16.87%	17.74%
	中国从欧盟进口	20.86%	22.38%	23.42%	24.18%	23.34%	22.00%

资料来源: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由于欧盟不同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存在差别,因此下文进一步分析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依赖关系。这部分首先对价值链上游依赖关系进行考察。上游依赖指的是一个国家(地区)从外国进口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后出口,这一出口产品便包含了上游国家创造的国外增加值,由此产生下游生产者对上游供应方的依赖关系。上游依赖更加侧重生产中的联系,能够反映价值链中的生产依赖情况。

在中国对欧盟的上游依赖方面,如表6所示,中国对欧盟28国的整体依赖度从2013年的4.194%下降到2019年的3.282%,即中国出口增加值中的3.282%来自欧

盟。其中中国依赖度最高的欧盟国家是德国,2019年中国出口增加值中的1.055%来自德国,其次是法国(0.449%)、英国(0.357%)和意大利(0.333%)。中国对西欧的依赖度高于中东欧,中国对中东欧13国的依赖度仅为0.167%,介于荷兰和西班牙之间。整体而言,德国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最重要的欧洲合作伙伴,中国对德国的依赖度远高于对其他欧盟国家的依赖。然而,近年来中国对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的上游依赖度均出现下降。

表6 2013-2019年中国对欧盟成员国的上游依赖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欧盟28国	4.194%	3.962%	4.194%	3.628%	3.566%	3.304%	3.282%
德国	1.312%	1.128%	0.923%	1.157%	1.156%	1.067%	1.055%
法国	0.611%	0.591%	0.464%	0.506%	0.488%	0.450%	0.449%
英国	0.471%	0.488%	0.414%	0.391%	0.389%	0.357%	0.357%
意大利	0.456%	0.427%	0.340%	0.383%	0.369%	0.336%	0.333%
荷兰	0.220%	0.229%	0.178%	0.190%	0.187%	0.175%	0.174%
中东欧13国	0.188%	0.183%	0.188%	0.171%	0.174%	0.168%	0.167%
西班牙	0.172%	0.162%	0.135%	0.163%	0.153%	0.143%	0.143%
比利时	0.189%	0.180%	0.148%	0.154%	0.148%	0.135%	0.135%
瑞典	0.162%	0.161%	0.129%	0.141%	0.139%	0.129%	0.128%
芬兰	0.142%	0.144%	0.115%	0.125%	0.123%	0.115%	0.115%
奥地利	0.122%	0.121%	0.098%	0.104%	0.100%	0.094%	0.094%
捷克	0.061%	0.060%	0.048%	0.055%	0.055%	0.053%	0.052%
丹麦	0.062%	0.058%	0.047%	0.055%	0.052%	0.047%	0.047%
爱尔兰	0.039%	0.041%	0.035%	0.040%	0.042%	0.042%	0.041%
波兰	0.046%	0.044%	0.036%	0.040%	0.042%	0.041%	0.041%
葡萄牙	0.031%	0.030%	0.026%	0.029%	0.028%	0.026%	0.026%
匈牙利	0.023%	0.023%	0.019%	0.021%	0.021%	0.021%	0.021%
罗马尼亚	0.016%	0.016%	0.013%	0.017%	0.017%	0.017%	0.016%
斯洛伐克	0.010%	0.010%	0.008%	0.010%	0.010%	0.009%	0.010%
卢森堡	0.009%	0.010%	0.009%	0.009%	0.010%	0.009%	0.009%

希腊	0.009%	0.009%	0.007%	0.010%	0.009%	0.009%	0.009%
斯洛文尼亚	0.009%	0.009%	0.007%	0.008%	0.008%	0.008%	0.008%
保加利亚	0.007%	0.007%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克罗地亚	0.002%	0.002%	0.002%	0.003%	0.003%	0.003%	0.003%
马耳他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立陶宛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爱沙尼亚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拉脱维亚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塞浦路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资料来源:UNCTAD,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而在欧盟对中国的价值链依赖度方面,如表 7 所示,欧盟整体对中国的上游依赖度从 2013 年的 2.845% 上升到 2019 年的 5.727%。具体到成员国,对中国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国家。中东欧 13 国对中国的依赖度达到 7.591%,高于欧盟平均值,其中匈牙利对中国依赖度最高,2019 年匈牙利 11.942% 的出口增加值来自中国。此外,爱沙尼亚、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同样高度依赖中国上游供应,中国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的主要上游供应地。而德国在欧盟则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其出口增加值中仍有 4.446% 来自中国,比 2013 年提高 1.3% 以上。总体而言,近年来欧盟在全球价值链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快速提高,尤其是中东欧国家。德国和法国对中国的依赖虽然相对较低,但中国对西欧国家供给的重要性快速提升。

表 7 2013-2019 年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上游依赖度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匈牙利	5.215%	5.414%	5.689%	10.755%	11.268%	11.905%	11.942%
荷兰	4.137%	4.218%	4.508%	9.786%	10.087%	10.835%	10.873%
爱沙尼亚	4.078%	4.044%	4.145%	9.187%	9.533%	10.062%	10.143%
波兰	2.786%	2.903%	3.014%	8.482%	8.970%	9.379%	9.425%
斯洛伐克	3.362%	3.512%	3.780%	8.023%	8.539%	9.098%	9.094%
英国	2.687%	2.619%	2.744%	7.328%	7.448%	8.101%	8.120%
罗马尼亚	2.823%	2.944%	3.135%	7.377%	7.581%	7.877%	8.047%

丹麦	2.839%	3.034%	3.146%	6.811%	7.181%	7.795%	7.814%
中东欧 13 国	3.195%	3.321%	3.498%	6.847%	7.143%	7.541%	7.591%
芬兰	2.498%	2.553%	2.701%	6.461%	6.784%	7.302%	7.327%
爱尔兰	3.756%	3.709%	3.659%	5.478%	5.479%	5.652%	5.734%
欧盟 28 国	2.845%	2.948%	3.158%	5.115%	5.279%	5.698%	5.727%
希腊	1.821%	1.885%	2.047%	5.077%	5.219%	5.678%	5.651%
保加利亚	1.725%	1.768%	1.732%	5.120%	5.273%	5.600%	5.609%
比利时	3.214%	3.403%	3.632%	4.817%	5.041%	5.482%	5.493%
西班牙	2.134%	2.205%	2.219%	4.766%	4.918%	5.290%	5.315%
马耳他	3.675%	3.635%	3.749%	4.973%	5.085%	5.223%	5.262%
瑞典	1.778%	1.783%	1.847%	4.545%	4.726%	5.121%	5.143%
葡萄牙	1.470%	1.514%	1.526%	4.050%	4.164%	4.500%	4.527%
德国	3.084%	3.342%	3.790%	4.003%	4.059%	4.406%	4.446%
拉脱维亚	1.392%	1.378%	1.384%	4.102%	4.137%	4.338%	4.371%
立陶宛	2.664%	2.781%	2.890%	3.920%	4.036%	4.309%	4.329%
捷克	2.774%	2.900%	3.098%	3.610%	3.654%	3.893%	3.922%
奥地利	2.375%	2.430%	2.591%	3.385%	3.519%	3.794%	3.807%
斯洛文尼亚	2.573%	2.680%	2.873%	3.401%	3.475%	3.671%	3.699%
法国	2.203%	2.168%	2.259%	3.152%	3.351%	3.650%	3.664%
意大利	2.236%	2.307%	2.418%	3.095%	3.263%	3.578%	3.610%
卢森堡	2.195%	2.153%	2.165%	3.119%	3.186%	3.456%	3.441%
塞浦路斯	2.546%	2.690%	2.663%	3.167%	3.172%	3.351%	3.366%
克罗地亚	1.537%	1.636%	1.604%	2.164%	2.382%	2.559%	2.559%

资料来源:UNCTAD,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与上游依赖度不同,最终需求依赖度从最终需求出发,通过测算一国最终需求中他国创造的增加值,找出该国最终需求的对外依赖程度。一国最终需求中包含的他国创造的增加值越高,其对最终需求的依赖越大。如表 8 所示,中国最终需求增加值中的 85.81%来自国内,并且一直呈现增长趋势。最大的外国来源地是欧盟(2.57%),其次是美国(2.12%),欧美同时也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德国是对中国最终需求贡献率最高的欧洲国家,比例达到 0.87%,其次是法国(0.34%)和英国(0.32%)。中国市场

对西欧的依赖度高于对中东欧的依赖度。不过从趋势上看,中国最终需求依赖度对欧美主要国家均处于持续下降的态势,只有对中东欧的依赖度小幅提高。

表 8 2005-2015 年中国对欧美主要经济体的最终需求依赖度

	2005 年	2007 年	2009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中国	80.09%	81.54%	84.80%	81.81%	83.56%	85.81%
欧盟	3.48%	3.28%	2.70%	3.07%	2.76%	2.57%
美国	2.25%	2.07%	1.71%	1.93%	1.98%	2.12%
德国	1.14%	1.13%	0.97%	1.12%	0.98%	0.87%
法国	0.50%	0.44%	0.34%	0.37%	0.35%	0.34%
英国	0.38%	0.32%	0.23%	0.30%	0.31%	0.32%
意大利	0.36%	0.34%	0.25%	0.28%	0.24%	0.23%
中东欧 13 国	0.14%	0.16%	0.15%	0.20%	0.19%	0.18%
荷兰	0.17%	0.15%	0.12%	0.13%	0.12%	0.11%
西班牙	0.12%	0.13%	0.11%	0.12%	0.11%	0.10%
瑞典	0.14%	0.13%	0.12%	0.12%	0.11%	0.09%
爱尔兰	0.07%	0.07%	0.08%	0.07%	0.06%	0.07%
奥地利	0.08%	0.08%	0.07%	0.08%	0.07%	0.07%
比利时	0.10%	0.09%	0.08%	0.10%	0.08%	0.06%
丹麦	0.11%	0.09%	0.07%	0.07%	0.06%	0.06%
波兰	0.04%	0.05%	0.04%	0.05%	0.05%	0.05%
芬兰	0.10%	0.09%	0.07%	0.06%	0.05%	0.04%
捷克	0.02%	0.03%	0.03%	0.04%	0.03%	0.03%
匈牙利	0.02%	0.03%	0.03%	0.03%	0.02%	0.02%
葡萄牙	0.02%	0.02%	0.01%	0.02%	0.02%	0.02%
斯洛伐克	0.01%	0.02%	0.02%	0.03%	0.03%	0.02%
罗马尼亚	0.01%	0.01%	0.01%	0.02%	0.02%	0.02%
希腊	0.03%	0.02%	0.02%	0.02%	0.01%	0.01%
卢森堡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保加利亚	0.00%	0.00%	0.00%	0.01%	0.01%	0.01%
斯洛文尼亚	0.00%	0.01%	0.00%	0.01%	0.01%	0.01%

克罗地亚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立陶宛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马耳他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爱沙尼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拉脱维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塞浦路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资料来源: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如表 9 所示,2015 年欧盟市场的增加值中约 1.94% 来自中国,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度总体上高于西欧,捷克对中国最终需求的依赖度从 2005 年的 1.19% 猛增到 2015 年的 4.04%。此外,中国对斯洛伐克、波兰、爱沙尼亚的市场贡献率同样很高。2015 年,中东欧 13 国的最终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度达到 2.86%。而欧洲发达经济体对中国依赖度最高的是英国、西班牙和德国,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最终需求依赖度上升明显。

表 9 2005-2015 年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最终需求依赖度

	2005 年	2007 年	2009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捷克	1.19%	1.89%	2.20%	2.96%	3.12%	4.04%
斯洛伐克	1.14%	1.83%	1.76%	2.37%	3.03%	3.73%
波兰	0.93%	1.56%	1.86%	2.16%	2.53%	3.42%
爱沙尼亚	1.45%	1.95%	1.54%	2.41%	2.76%	3.27%
中东欧 13 国	0.97%	1.45%	1.60%	1.97%	2.18%	2.86%
斯洛文尼亚	0.90%	1.39%	1.41%	1.84%	1.99%	2.55%
匈牙利	1.06%	1.32%	1.37%	1.41%	1.59%	2.32%
英国	0.80%	1.10%	1.31%	1.70%	1.97%	2.14%
西班牙	0.80%	1.22%	1.02%	1.41%	1.60%	2.11%
保加利亚	0.93%	1.75%	1.45%	1.37%	1.71%	2.06%
德国	0.63%	0.98%	1.20%	1.76%	1.67%	1.96%
欧盟	0.72%	1.06%	1.14%	1.51%	1.60%	1.94%
马耳他	0.70%	1.07%	1.64%	1.93%	1.57%	1.93%
奥地利	0.61%	0.88%	0.95%	1.32%	1.53%	1.91%
芬兰	0.94%	1.35%	1.31%	1.15%	1.78%	1.90%

欧元区	0.69%	1.03%	1.07%	1.45%	1.49%	1.83%
法国	0.71%	0.97%	1.03%	1.40%	1.50%	1.79%
比利时	0.97%	1.30%	1.25%	1.39%	1.38%	1.69%
丹麦	0.67%	0.95%	1.13%	1.16%	1.36%	1.64%
意大利	0.65%	0.99%	0.94%	1.38%	1.25%	1.63%
荷兰	0.61%	0.90%	0.84%	1.04%	1.13%	1.60%
爱尔兰	0.70%	1.03%	1.08%	1.23%	1.48%	1.60%
希腊	0.68%	1.16%	1.49%	1.35%	1.25%	1.59%
罗马尼亚	0.83%	0.89%	0.95%	1.27%	1.25%	1.58%
立陶宛	0.70%	0.94%	0.71%	1.00%	1.15%	1.51%
瑞典	0.62%	0.88%	0.84%	1.04%	1.19%	1.48%
塞浦路斯	0.77%	1.29%	1.13%	1.11%	0.98%	1.37%
拉脱维亚	0.59%	0.89%	0.68%	1.06%	1.17%	1.36%
克罗地亚	0.94%	1.40%	1.34%	1.51%	1.09%	1.26%
葡萄牙	0.38%	0.64%	0.61%	0.80%	0.85%	1.17%
卢森堡	0.38%	0.46%	0.59%	0.65%	0.70%	0.88%

资料来源: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德国是欧盟经济和价值链的核心,2018年其出口增加值占欧盟28国的27%。^①同时德国也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德贸易额达到2121亿欧元,占中欧贸易额的36.2%。^②中德经贸关系是中欧贸易中最核心的双边关系,中德经贸依赖关系直接影响中欧经贸关系,因此理解中德产业结构对于研究中欧产业结构十分重要。下文将对与中国价值链联系最紧密的德国进行具体分析,从制造业视角分析中德产业结构和依赖关系。

如表10所示,德国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中对中国出口占比从2005年的3.56%上升到2015年的8.65%,中国对德国中间产品进口增加值的贡献率则从2.93%上升到6.58%,这说明中国已逐渐成为德国重要的生产合作伙伴,中国在德国价值链上生产端的地位持续提高,已处于中上游的位置。而在最终产品方面,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展现出优势,德国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的8.39%(2015年)销往中国。中国对德国消费市场的贡献逐年提高(2015年为8.37%),不过仍低于德国对中国最终产品进口增

^① 资料来源:UNCTAD,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②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加值的贡献。中国最终产品进口增加值中来自德国的占比在 2010 年和 2015 年均高于 8%,这说明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德国产品在中国消费市场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中德两国在价值链的上下游联系集中体现在制造业上,中国已经成长为德国制造业中间产品的重要供应方,2015 年德国 10.64%的中间产品进口增加值来自中国。同时中国还是德国制造业下游增加值主要来源方,2015 年德国制造业最终产品进口增加值中 14.8%来自中国,十年间提高了近 9.36%。而中国制造业最终产品进口增加值中来自德国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10%以上,反映了两国制造业在下游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表 10 2005-2015 年中德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出口增加值相互占比

		中间产品			最终产品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所有行业	中国出口增加值中对德国出口	3.23%	3.95%	3.27%	2.88%	5.22%	3.52%
	德国出口增加值中对德国出口	3.56%	5.07%	8.65%	3.10%	7.34%	8.39%
	中国进口增加值中来自德国	3.73%	3.57%	4.55%	8.17%	10.67%	8.51%
	德国进口增加值中来自中国	2.93%	4.88%	6.58%	3.05%	8.93%	8.37%
制造业	中国出口增加值中对德国出口	3.24%	3.98%	3.25%	3.52%	5.22%	4.37%
	德国出口增加值中对德国出口	3.99%	6.14%	10.24%	2.94%	8.76%	7.60%
	中国进口增加值中来自德国	4.63%	5.51%	6.28%	10.36%	13.64%	12.42%
	德国进口增加值中来自中国	4.83%	8.28%	10.64%	5.44%	14.51%	14.80%

资料来源: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如表 11 所示,中国对德国上游供应的依赖度从 2005-2017 年出现下降,依赖度最高的产业是计算机、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以及交通设备,2017 年德国在这两个行业对中国的贡献度均达到 1.77%。与此同时,德国对中国上游产业依赖度则持续上升,其中依赖度最高的是纺织业,2017 年达到 6.62%,紧随其后的是计算机、电子设备、电气设备(4.6%)和交通设备(3.63%)。德国和中国是全球创造出口增加值最高的两个国家,中德贸易又是份额最高的中欧国家间贸易关系,因此,两国的价值链依赖关系直接影响中欧价值链关系。电子设备和交通设备是中德和中欧之间进出口贸易额最高的两个产业,并且是双方对外直接投资最密集的行业。中德双方在电子设备和交通设备领域的上游融合度较高且相互依赖,中德及中欧均有大量企业布局在相关行业,从而形成了巨大且富有

韧性的合作网络。此外,德国对中国纺织业的单方面依赖度稳步提升,而纺织业正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创造了最多的出口增加值。

表 11 2005-2017 年中德上游相互依赖度

	中国对德国上游依赖度			德国对中国上游依赖度		
	2005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05 年	2015 年	2017 年
食品、饮料及烟草	0.59%	0.46%	0.59%	0.99%	1.73%	2.30%
纺织品、服装、皮制品和相关产品	0.82%	0.62%	0.79%	3.34%	6.74%	6.62%
木材、纸制品、印刷品	1.28%	0.92%	1.15%	0.80%	1.69%	2.25%
化学品和非金属矿产品	1.17%	0.86%	1.09%	1.37%	2.86%	3.10%
基本金属和金属加工品	1.17%	0.85%	1.06%	1.26%	2.78%	3.02%
机械设备	1.75%	1.28%	1.58%	1.31%	2.61%	2.98%
计算机、电子设备及电气设备	1.85%	1.39%	1.77%	2.21%	4.42%	4.60%
交通设备	1.93%	1.39%	1.77%	1.46%	2.93%	3.63%

资料来源:UNCTAD,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在最终需求依赖度方面,如表 12 所示,德国在大多数制造业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度都高于中国对德国的依赖度,特别是纺织品、服装、皮制品以及计算机、电子设备、电气设备这两个大类上,德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分别达到 23.25% 和 16.61%,这表明中国纺织品和计算机设备已经是德国最终市场上主要的增加值贡献方,并且在德国市场的优势地位不断提高。在制造业分类中,中国只有交通设备对德依赖度高于德国对华依赖度,证实了德国汽车行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

表 12 2005 年和 2015 年中德最终需求相互依赖度

	中国对德国最终需求依赖度		德国对中国最终需求依赖度	
	2005	2015	2005	2015
食品、饮料及烟草	0.99%	1.73%	0.77%	1.85%
纺织品、服装、皮制品和相关产品	3.34%	6.74%	8.16%	23.25%
木材、纸制品、印刷品	0.80%	1.69%	1.12%	3.04%
化学品和非金属矿产品	1.37%	2.86%	0.92%	2.55%
基本金属和金属加工品	1.26%	2.78%	1.34%	3.90%

机器设备	1.31%	2.61%	1.65%	5.20%
计算机、电子设备及电气设备	2.21%	4.42%	3.64%	16.61%
交通设备	1.46%	2.93%	1.19%	2.92%

资料来源: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三 中欧依赖关系的特征:非对称性关系缓解

根据上文对数据的对比分析,本部分尝试讨论中欧依赖关系的特征及原因。具体而言,中欧经贸依赖关系变化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的特征。

第一,整体趋势上,中国对欧盟的依赖度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度提高。贸易方面,2013-2019年,中欧贸易额占中国GDP的比重下降0.9%,占欧盟GDP的比重则上升了0.9%。价值链方面,中国对欧盟上游依赖度从2013年的4.194%下降到2019年的3.282%,同时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度则从2.845%上升到5.727%。2005-2015年,中国对欧盟最终需求依赖度从3.48%下降到2.57%,欧盟对中国最终需求依赖度从0.72%上升到1.94%。

第二,产业结构上,中欧经贸往来主要集中在电子设备、机械制造和交通设备领域,相关价值链高度融合并相互依赖。2019年,欧盟从中国进口的电子设备及机械设备分别占其总进口额的47.66%和35.79%,中国从欧盟进口的汽车设备和机械设备分别占中国相关行业进口额的53.02%和25.04%。欧盟高度依赖中国的电子设备产业,而中国则高度依赖欧盟的汽车产业。从产业关系看,中欧双方均依赖对方的最终产品,2015年欧盟最终产品进口增加值中的中国占比达到19.8%,而中国最终产品进口增加值中的欧盟占比自2005年来一直保持在20%以上。

第三,地区特征上,中国对西欧国家的依赖高于对中东欧国家的依赖,中东欧国家相比于西欧国家更加依赖中国。中国上游依赖度和最终需求依赖度最高的欧盟国家都是德国,尽管依赖度不断下降,但在2019年依然达到1.055%和0.87%,排在第二的是法国(0.449%和0.34%)。德国对中国最为依赖的行业是纺织业,上游依赖度和最终需求依赖度分别达到6.62%(2017年)和23.25%(2015年);其次是计算机电子设备,两类依赖度为4.6%(2017年)和16.61%(2015年)。而中东欧国家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均依赖中国,2019年匈牙利对中国上游依赖度达到11.942%,2015年捷克对中国最终需求依赖度也达到了4.04%。这种地区性差异源于中欧双方产业结构和上下游

关系的区别。中国主要进口欧盟的汽车和机械设备,这两类产品均是德法等西欧国家的优势产业;中国对欧盟进口产品集中于电子设备和机械设备,并且面对最终消费市场,因而中东欧国家是重要消费市场。而中东欧国家作为欧盟主要的加工制造业地区从中国进口零部件进行组装,销往欧洲其他地区。

上述特征背后主要包含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对欧盟单向依赖的非对称性关系有所缓解,区域性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出口增加值越来越多地来自中国国内市场,2019年这一比例达到86.6%,中国对欧盟主要国家的依赖度持续下降。同时亚洲区域价值链体系依旧保持较高的重要性,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06%和1.43%,超过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在对欧盟依赖逐年下降的同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对东盟国家的依赖度有所提升,从2005年的1.59%上升到2019年的1.62%。^①更为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东盟首次取代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预示着双方在价值链的互动愈发活跃,亚洲区域价值链的活跃程度和发展潜力进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欧盟内部统一市场对欧盟成员国固然十分重要,但边际效用在下降,欧盟对中国依赖度在提升。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成立以来,取消壁垒的单一市场极大推进了欧盟内贸易,2020年欧盟内贸易占本国总贸易额一半以上的成员国达到24个。然而,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放缓,欧盟内贸易重要性下降,2020年27个成员国中的17个国家的欧盟内贸易额比例低于2002年的水平,其中欧盟重要的贸易国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欧盟外贸易额比例均有所提高。^②这一趋势与中国制造业以及亚洲区域价值链的蓬勃发展不无关系。^③中国与中东欧地区之间不仅贸易往来密切,而且价值链的融合程度更加深入,中国成为中东欧国家制造业重要的上游供应商。同时西欧国家与中国合作方式升级,从传统的加工贸易转变为技术研发合作,中国企业不断地向中欧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借助欧洲跨国企业的供应网络嵌入国际分工体系。

四 中欧经贸依赖关系变化的影响: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交织

后疫情时代,中欧经贸依赖关系的变化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一方面,价值链布局将

^① UNCTAD,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② “Intra-EU Trade in Goods—Main Feature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Intra-EU_trade_in_goods_-_main_features#Intra-EU_trade_in_goods_compared_with_extra-EU_trade_in_goods.

^③ 余南平:《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载《欧洲研究》,2021年第1期,第92页。

局部调整,安全性成为重点考量因素;另一方面,欧盟将更加看重“经济主权”,非经济因素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即便如此,经贸关系仍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

(一) 价值链面临短平化、就近化重塑,安全性成为重要因素

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缩短,国际分工将简化。信息技术革命和跨国交通便利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缩小了地理距离带来的贸易鸿沟,虽然资源全球布局一直是寻求效率优先的跨国企业的默认首选,但同时带来全球价值链演变为链条过长、流程过于复杂的供应网络,导致脆弱性增加。疫情期间不断出现的社会封锁、生产运输中断不仅导致全球供应停摆,而且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欧美消费大国运输成本攀升、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抬头,跨国企业成本陡增。因此,不论中国企业还是欧洲企业都需重新评估供应布局策略和风险控制指标,供应安全的优先级大大提高,曾经被技术进步抹平的地理距离可能会重新分割国际价值链,部分产业和生产流程将被布局在离市场距离近、运输条件有保障、稳定性更优的地区,中间产品生产过程将会减少,全球价值链将简化甚至萎缩。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加强,核心经济体的外沿国家将通过承接跨国企业回迁迎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机遇。中东欧凭借其区位、成本优势以及欧盟成员国身份的政治便利成为欧洲企业分散化调整的目的地之一;同时,东盟也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不仅中国与东盟贸易往来迎来新高潮,欧盟也在积极布局东盟投资。2020年《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生效,欧盟正积极与印尼、菲律宾进行自贸协定谈判。不论从印太战略、经营成本抑或市场潜力方面考量,东南亚地区都可能成为跨国企业分散化布局的受益者,进而加速亚洲地区“雁阵模式”的发展。

(二) 欧盟将进一步强化“经济主权”,非经济因素成为重点考量

国际秩序的变化直接影响欧洲对经济主权的决策意向。当大国竞争带来的地缘政治主导国际格局时,欧洲呼吁经济主权的力度就会上升,而当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国际社会开放时,欧洲自由主义的声音便会超过对主权的诉求。每当欧洲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扩大时,国家干预主义就更受青睐;而当差距缩小时,欧盟决策层就倾向市场主义和经济自由化。^①当前中美关系的变化深刻影响国际秩序,而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欧盟在人工智能、5G等尖端技术上与美国差距扩大,并落后于中国,“经济主权”重新成为欧盟的核心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打造“地缘政治委员会”,意在突出战略安全,而新冠疫情又进一步加快了欧盟强化经济主权的进程。欧盟经济主权已经不局限于理论认知,而是落实到具体政治行动

^① 忻华:《“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战略内涵分析》,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6-9页。

中,如大力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加强供应安全、增加能源供给投入和前沿科技领域投资。这是欧盟通过价值链重塑实现欧洲经济主权和战略自主的共同行动。^①此外,欧盟通过主导国际规则制定加强经济主权并提升国际影响力,将价值观、政治理念融入规则制定中。例如,在数字领域,欧盟借助《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呈现范式扩张,其个人数据保护的价值观正在融入中日韩等数据资源更多的国家,欧盟“数据法律帝国”已现雏形。^②2021年6月11日,德国议会正式通过《供应链尽职调查法》(Lieferkettensorgfaltspflichtengesetz),要求德国企业必须对其全球供应商进行人权和环保履行情况的尽职调查,以确保其合规,一旦发现供应商违规,企业将面临最高额为全球年营收2%的罚款。^③2021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份关于企业实施尽职调查的立法倡议,以此表明支持供应链合规审查的立场。通过将意识形态、人权与经贸问题结合,欧洲企业供应链自我审查规定可能会成为影响中欧价值链合作的不确定因素。欧盟频繁以对抗性的政治逻辑处理对华经贸关系,用“地缘战略”夸大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并将经贸问题的“政治化”与政治分歧“合流”,显然是中欧经贸关系中的阻碍。^④政治与商业将相互拉扯形成巨大张力,企业决策由此会面临更高的政治风险。

(三) 经贸关系仍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

中国科技实力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战略高技术领域已取得重要进展。^⑤拜登政府尽管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展开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政策,但与前任策略不同的是,它通过在欧洲和印太地区建立同盟进行战略布局,联合盟友限制甚至中断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中间产品供应,意图在价值链高附加值部分孤立中国,在芯片、5G等前沿技术领域遏制中国发展势头,将中国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最终达到重塑全球价值链、维护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和全球霸权的目的。因此,处于中美博弈之中的欧盟的作用愈发重要。在缺乏强大军事实力、综合实力逐渐衰落的情况下,欧盟在中美欧三方经贸博弈中采取“借力型战略”,存在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同时与中国维护

① 余南平:《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第84-91页。

② 金晶:《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欧盟标准——规则建构、司法推动与范式扩张》,载《欧洲研究》,2021年第4期,第90页。

③ “Das Lieferkettensorgfaltspflichtengesetz im Überblick,” 21 December 2021, <https://www.gtai.de/gtai-de/trade/recht/rechtsbericht/deutschland/das-lieferkettensorgfaltspflichtengesetz-im-ueberblick-726540>.

④ 赵柯、李刚:《欧盟产业结构变化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载《国际贸易》,2020年第4期,第77页。

⑤ 《习近平: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2018年5月29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28/c_1122899973.htm.

经贸关系的可能,以此从中美紧张关系中牟利。^① 尽管非经济因素会影响欧洲企业的经济行为,经贸关系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作用有所减弱,但由于客观上中欧价值链的高度融合,所谓“脱钩”的政治诉求无法拆解中欧的依赖关系。2021年阿登纳基金会联合 Ifo 经济研究所对德国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冲击并未对德国企业全球布局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只有约 10% 的受访企业准备将供应网络迁回德国或欧盟。另有少部分企业计划调整采购策略,而且主要集中在加强供应体系监控和库存管理以及多样化采购等小范围调整方面。在供应链管理和调整上,德国企业表示并不需要政策干预。^② 相互依赖并非仅意味着一方能够供给另一方所依赖的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交往产生相互影响,增加分离所产生的代价。中欧之间不仅表现为传统进出口贸易的相互依赖,而且在价值链上的融合比以往更加深入,大量企业进行产业布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地区层面,中国与德国、法国等欧盟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价值链高度融合,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匈牙利、爱沙尼亚、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度升高,逐步被吸收进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中欧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构建了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网络,任何破坏双边合作的行为都可能给双方的生产、消费和社会福利带来巨大成本。疫情期间,中国市场率先复产复工,对欧盟对华出口以及欧洲企业在华经营起到了积极的稳定器作用,2020年,大众和戴姆勒在华汽车交付量分别占其全球交付总量的 41% 和 30.6%。^③ 未来中国市场将成为欧盟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后疫情时代的经贸关系仍将发挥中欧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锚的作用。

五 结语:推进高水平开放与中欧合作

中国与欧盟同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也都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中美欧三方博弈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欧盟对华态度转变不仅体现为欧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疑虑,而且反映出欧盟内部困局带来的焦虑。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新

^① 张晓通:《欧盟在中美欧经贸大三角中的“借力型战略”》,载《欧洲研究》,2021年第3期,第17-42页。

^② “Internationale Wertschöpfungsketten-resilienter als gedacht,” 8 July 2021, <https://www.kas.de/de/kurzum/detail/-/content/internationale-wertschoepfungsketten-resilienter-als-gedacht>.

^③ 《德国车企依赖中国市场,与日系车终有一战?》,2021年3月17日, <https://www.caixin.com/2021-03-17/101676703.html>; “Daimler & Volkswagen präsentieren überraschend starke Geschäftszahlen für 2020—ein Grund ist China,” 29 January 2021, <https://www.businessinsider.de/wirtschaft/mobility/daimler-volkswagen-praesentieren-ueberraschend-starke-geschaeftszahlen-fuer-2020-ein-grund-ist-china/>.

冠危机中,欧盟的治理模式受到内部不同力量的质疑和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对欧洲经济界的吸引力上升,以及欧盟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与日俱增;加上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经贸往来和产业协同的深入触动了欧盟的敏感神经。因此,欧盟对华政策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疑虑中国的崛起,惧怕“竞争者”中国,不断将中国进行类别化和标签化,视中国为“制度性对手”;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诱人的中国市场,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它为欧洲跨国企业复苏提供了重要保证。“战略自主”虽然具有在中欧美博弈中强化自身经济主权的目,但也体现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的倾向,是对与中国竞争的回应。随着欧盟强化“经济主权”和“技术主权”,意图降低对华依赖,并将人权等价值观融入国际技术竞争,中欧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①欧盟对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技术的保护也将更加严格。

尽管中欧经济结构竞争性上升,但互补性依旧是主导。德国等欧盟国家在高端制造业,特别是尖端机械制造、光学技术和汽车核心零部件处于价值链上游;而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电子设备、纺织品和中端机械制造,西欧依然是成熟稳定的市场,中东欧也拥有巨大市场潜力。^② 中欧之间价值链高度融合且相互依赖,新冠疫情下中欧贸易逆势上涨即证明了双方经贸关系的韧性。虽然中欧价值链面临区域化、分散化的重构调整,但这种调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欧经贸合作日益紧密的趋势;新技术赋能的价值链升级为双方协作提供了新的可能,绿色经济也为中欧合作开拓了新的空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则为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此外,价值链重构调整为中补齐自身短板、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机遇和动力。中国应以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应对价值链调整的冲击,尊重经济规律,借助市场激励和竞争机制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技术创新;同时进一步强化价值链的自主可控,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不仅在前沿科技领域加强自主创新,而且要在传统制造业,如汽车制造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做大做强本土企业。

(作者简介:寇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黄郑亮:《新冠疫情下欧盟对全球价值链参与路径的调整与结构重塑》,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第40-53页。

^② 寇蔻、史世伟:《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德经贸依赖关系》,第65-68页。